

學林

← (上接9版)

2月《现代学生》第5期又重新发表。这一演讲曾收入胡适文集和多种选集,内容无误。然而郭文彬选本收录的《为什么读书》却出自1930年12月光华书局出版的《读书月刊》1卷2期,是一位署名维文的作者听过胡适演讲后,“又读到他一篇关于读书的论文”,“根据胡先生的演讲和论文而写的”。这篇《为什么读书》不仅文字风格与原稿迥异,也删掉了不少细节和例子,且有不合胡适原意之处。如举例达尔文物竞天择之说曾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以说明开卷有益,胡适审定的讲稿总结为:“读了经济学的书,可以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维文的版本却写成“按照经济学原则,达尔文主义是很没有条理的,而我们读书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实属误导读者。维文版也有比胡适讲稿更详细之处,如论述为读书而读书时,原稿引用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一句为据,维文版引出整段。但这却是胡适在《读书》原稿引用过的,被挪用到此处。维文版末尾几段讨论读书精与博和“四到”,也是对胡适《读书》一稿的复述。郭文彬选本舍胡适原文而采用他人复述的版本,并隐去真实出处,可以想见为私自编印,未得到原作者认可。那么,编者为何会反常地采用这篇本身并不知名的篡改版呢?

《怎样读书》中选录的蔡元培、马寅初、樊仲云、童行白、欧元怀、傅东华、曹聚仁、孙福熙、张素民、程瑞霖的文章均发表于1935年4月《文化建设》1卷7期的“读书经验谈”专题,并非编者自行收集,但大部分未标出处。除维文综述的《为什么读书》外,书中陈钟凡和王云五的文章,以及章衣萍《我的读书经验》原本也出自《读书月刊》,后者开篇即声明是应“《读书月刊》编辑顾切干先生”的约稿。不过《怎样读书》章衣萍此篇并未用《读书月刊》版,而是采用了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版《衣萍文存》里,作者将结尾部分修改后的版本。编者对其他文章直接照搬杂志,却能注意到这篇有过改动,也颇不寻常。《读书月刊》1930年11月创刊,由光华书局的编辑顾凤城(字切干)主编。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就是维文的《读书法通论》,《为什么读书》排在第2期首篇,第3、4期合刊又载有维文的《青年自学问题》。连续三期刊登维文的稿件,表明

其人与编者关系密切。1934年,光华书局将《读书月刊》的若干文章辑成《读书文选》,所选作者大都仅收录一篇,且均为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没有使用笔名、身份难辨的,却收入了维文的《读书法通论》和《青年自学问题》两篇文章。《读书月刊》前两期还刊有多篇主编顾凤城用凌梅和小萍两个笔名发表的文字,第3-4期卷首则是他署名顾切干发表的《研究学问的方法》。从《读书月刊》第2期起,顾凤城的胞弟顾其城(字森干)也用森干、朱介民、夏瑞民、瑞民等多个化名投稿。顾氏兄弟均喜频繁变换笔名,1936年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袁涌进编辑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曾列出二人使用的部分笔名(其中称张香山为顾凤城笔名系误植),未列入维文。无论从文章内容和风格,还是受到的特别青睐判断,维文也应是顾氏兄弟的一个笔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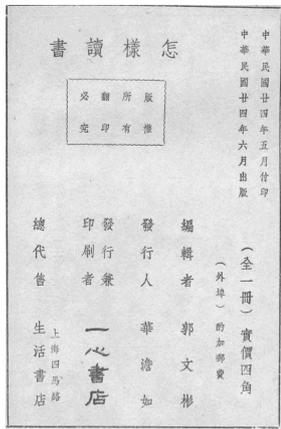
青年顾凤城、顾其城的“成功之路”

1926年夏,无锡工商中学学生顾凤城积极参与中共无锡独立支部组织的无锡青年社,当选为候补执委,同年底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友实业社当了会计,不久,几位地下党员在奉贤县创办曙光初级中学,他也辞职加入。1928年4月曙光中学被查封,顾凤城又来到上海,到泰东图书局任校对,从此进入出版界,同时从事创作,用笔名洁梅在泰东出版了小说《落红》,1929年和1930年,又相继在光华书局和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没落的灵魂》和《莉娜之死》,但并未成功跻身文坛。1930年3月,他曾出席左联成立大会,上了当局“严密查拿究办”的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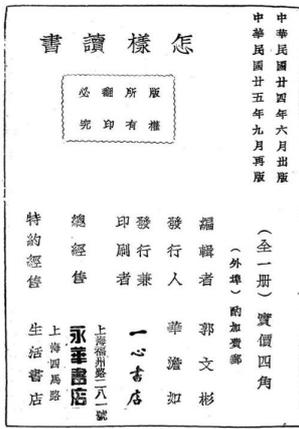
单。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和同人刊物原本都在泰东图书局出版,后创造社脱离泰东自办出版部,对泰东的业务造成冲击。1929年,已显颓势的泰东编辑部裁员,顾凤城失了业。曾在泰东工作过的张静庐和沈松泉会同沈松泉好友卢芳在1925年创办了光华书局,出版新文艺书籍。1929年,张静庐退出光华,沈松泉独自主持编务。经共产党员匡亚明引荐,顾凤城进入光华做了编辑。1930年秋,沈松泉赴日留学,顾凤城旋即在光华书局挑起大梁,除主编《读书月刊》外还编辑出版了《文艺创作讲座》四辑和《新兴文学概论》《新文艺辞典》等多本文学参考书。1932年1月,他与凭借《从军日记》声名鹊起的女作家谢冰莹结婚,更提升了知名度。

但顾凤城一向好出风头,屡次利用编辑之便突出自己。除在《读书月刊》大肆发表自家作品外,1932年,他编纂的《中外文学家辞典》赫然将自己列名其中,与夫人谢冰莹置于同一页。1931至1933年,他化名黄人影为光华书局编辑《郭沫若论》《创造社论》《茅盾论》时,均选入自己的文章且放在卷首。鲁迅在1933年的《文坛秘决十条》一文中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老婆和儿子,悉数详细编入”等语;1935年又在《逃名》中写到“自收自己的大名人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云云,显有讽刺顾凤城之意。1935年11月,平心编辑的《生活全国总书目》由生活书店出版,在《中外文学家辞典》条目下特意批注“编者一门三杰(意指顾凤城、谢冰莹和顾其城,但该事实未收入顾其城)都已编入,自吹自捧,东抄西剪,不值一阅”。顾凤城见后向生活书店严词抗议,再版的《全国总书目》将此句批语涂黑抹去。

顾凤城在上海出版界崭露



《怎样读书》1935年初版



《怎样读书》1936年再版,福州路281号永华书店总经理



一心书店1936年广告,朱光潜著《致青年》

头角后,顾其城也随之来到上海。兄弟二人均爱好文艺,从中学起便对青年如何读书自修和写作的问题特别关注,此后多次撰文讨论。1931年8月,顾其城化名朱介民在光华书局出版《学生读书指导》,以在《读书月刊》发表的几篇文章为基础,撮抄前人作品敷衍成篇。9月,他又将此前谈论读书作文和人生修养的书信体文章结集成《致青年》,由文艺书局出版,署名夏瑞民。当时流行的同类书籍已有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明书店1929年版)和舒新城的《致青年书》(中华书局1931年版),《致青年》面市后,《申报》曾刊出一篇署名骐人的《介绍〈致青年〉》,称该书“比《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更充实些,比《致青年书》更亲切些”,“是一个纯洁真诚的青年所吐露心声,而变成一部经验的指导,并非一般空泛的议论可比。”无论观点还是文笔都显得平庸幼稚的《致青年》被强行拔高,恐为作者一手操纵。1933年,顾其城化名维恒编辑《现代文艺书信》,由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文章大都出自中外著名作家,却突兀地放入了自己几篇已收入《致青年》的作品,其自我标榜之拙劣,直追乃兄。此时的顾其城已成为乐华图书公司编辑,1932年12月,乐华发行《出版消息》半月刊,即由他化名顾瑞民主编。《出版消息》除刊登出版界动态和新文学作家轶事外,重点宣传普罗文艺、革命文学、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等前进思潮,顾其城变换笔名贡献了大量篇幅。

《致青年》并未如愿畅销,旋即湮没无闻。然而到了1936年3月,这本书却被一心书店重新包装上市,改名《致青年——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封面仿照开明青年丛书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设计,作者署名也变成了仿冒朱光潜的“朱光潜”。甚至一心书店的新店徽也模仿开明书店,做成太阳光芒下书页摊开的样子。1936年4月,一

心书店出版郭文彬编辑的《修养与服务》,与《怎样读书》一样为时人文选,后衬页广告中,将“朱光潜著”《致青年》用最醒目位置宣传,称该书“是一部青年珍贵的生命史的供状”。不久朱光潜发现这本伪劣之作,在《申报》发表《朱光潜给朱光潜——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予以揭露。然而一心书店并未罢手,同年11月又推出了郭文彬编辑的另一本文集《我与创作》,广告页上仍原封不动宣传《致青年》。《我与创作》选入的18篇文章里,有16篇都是光华书局1931至1933年间出版的《文艺创作讲座》《现代中国作家创作经验谈》和《创作指导集》中收录过的篇目。到了一心书店1937年出版的《山歌》后衬页上,仍有《致青年》的广告,仍是同样的宣传语,只把作者改回了“夏瑞民著”,可见编者对此书的来历心知肚明。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一直未以真面目示人的一心书店,幕后主办者中应有顾凤城顾其城昆仲,“郭文彬”恐为二人用过的又一化名。

早在1933年4月,《申报》广告中便有过一个一心书店,预告了“卿云书局总代售,一心书店总发行”的“长篇香艳社会小说”《迷汤》。卿云书局又名卿云图书公司,1926年出现,多出版艳情小说,总经理和发行人为陆友白。《迷汤》迟至1934年4月方正式出版,由卿云书局总发行,未再用一心书店名义。1933年间,这个与卿云书局有关联的一心书店也没有其他出版活动。1934年亮相、发行人为华澹如的一心书店同卿云书局的出版题材相去较远,似为重名。1934年1月,华澹如致信蔡元培,请其为《青年成功之路》一书题词,被婉拒。4月,一心书店发行了葛石熊编著的《青年成功之路》,版权页上未写明店址,仅写为文艺书局和生活书店总代售,题写书名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元老之一江恒源(问渔)。1930年,中华书局曾推出另一位职教界名流潘文安(仰尧)撰写的《青年成功之路》,一心书店这本同名书籍也请来潘文安题词。1935年出版《怎样读书》时,一心书店终于成功请到蔡元培题写书名,同时还有一幅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题签。《青年成功之路》与《怎样读书》这两本内容贴合大众需求又借助了名人光环的书得以再版,成了一心书店的招牌书,曾在《生活全国总书目》上打出广告。广告页上一心书店的地址为上海蓬莱市场。蓬莱市场位于南市小西门,各类国货店铺林立,将店址模糊写在此处有皮包书店意味。